

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回顧與前瞻(下)

賴光臨

肆、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新時代

一、大眾傳播事業奠立基石

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創立，開啓了大眾傳播事業的新時代。

「社會對報刊的觀感，已煥然改觀。自評論報刊創立，論議時政，介紹新知，內容革新，自是報刊成爲讀者週知全球大勢與獲取新知的源泉。過去有家長禁止子弟閱讀報刊，而今則幾人人知讀報有益。大眾對報刊日益重視，改變了昔日鄙薄的觀念。」

「報人多抱持民主信念，民國初元，報刊的命名多取「民權」、「民主」、「民意」、「自由」一類名詞，視自由爲民主政治的基本觀念。在思想上，深受西方民主思想的洗禮，開拓了報業理念的新境界。」

三、大眾傳播事業獲得法律的尊重與保障。民國初元，廢除了扼制報業的「大清報律」。三月十日，孫大總統公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，其中第二章第六條第四款規定：「人民有著作、言論、刊行之自由。」這是中國有史以來，第一次有國家大法保障大眾傳播事業。

當時內政部曾制訂三條「暫行報律」，通令全國一致遵行，而「全國報界俱進會」提出反對。中山先生知道後，立刻飭內政部撤銷。飭文中說，民國一切法律，皆當由參議員議決宣布，才算有效，不得以「暫行」二字，從權辦理。飭文並指出，言論自由爲各國憲法所重，所佈暫行報律，「使議者疑滿清鉗制輿論之惡政，復見於今，甚無謂也。」（註二八）

中山先生的飭文，可說是民國建立後，第一篇尊重法治、保障言論自由的重要文獻。

大眾傳播事業發展至是奠立了基石。

二、大眾傳播事業的多元化發展

從大眾傳播事業整體發展看，民元以後有幾項重大發展與成就：

一、報業革新，並出現獨立風格的報紙：民國成立以後，內憂外患交織，動亂不已，報業發展道途崎嶇。可喜的是，報業仍不斷進步。重要的見下述幾方面：

（一）新聞本位建立：以往評論報章重視評論，喻之爲報業的靈魂，於新聞則忽視。有商業性報紙因在評論上處弱勢，轉而在新聞上謀發展。當時上海幾家報紙，如申報、新聞報、時報等都重視首都的政治新聞，紛在北京設駐京通信員，又各競爭拍發專電新聞。

民國九年上海時事新報派人採訪公廨的公開法庭，是滬上報紙有專任外勤記者的開始，打破了「公雇訪員」制度。本埠新聞自此有比較、有競爭。此外，各報創設專欄新聞，如時事新報設「教育界」一欄，新聞報與申報均先後跟進，並由「教育」，進而開闢「工商」、「經濟」等新聞欄。

各報在新聞上競爭，加強守望功能，是很重要的一種進步，並由此影響全國報紙。

（二）報紙副刊功能提高：民國八年新文化運動澎湃，報紙副刊改進內容

，如時事新報的「學燈」，民國日報的「覺悟」，北京晨報的「副鐫」，都致力介紹學術新知，討論思想問題，並刊登譯著小說與新詩，負起傳播思想、學術、文學與娛樂的多重使命。而「南北各大報作『同聲之應』的，幾於不勝枚舉。」

(三)報章文體白話化：白話報刊發行甚早，但受社會重視，則在胡適提倡白話以後。七年冬季，白話雜誌相繼出現，如陳獨秀辦的「每週評論」，傅斯年、羅家倫辦的「新潮」，而「新青年」作者亦相約寫白話。及至「五四」運動發生，各地報刊紛紛創立，都運用白話文體寫作。

報章白話化過程，最早由副刊白起，時勢所趨，即使政客軍人辦的報紙，也不能不找幾個學生包辦一個白話附張。進一步便發展及於社論，胡適說是「白到頭上了。」(註二九)

此文體白話化，使讀者易讀易懂，直接擴張了報刊的影響力量。

(四)獨立性報紙出現：報業更重要的一項發展是，獨立性報紙的出現。

所謂獨立報紙指有別於政治性與商業性報紙而言，而兼有兩類報紙的特色，即以商業經營為手段，不以營利為目標，仍保持文人論政的本色與宗旨。

這類報紙最具代表性的，當推大公報。

大公報於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，由吳鼎昌、胡政之、張季鸞主持復刊，標揭「四不」原則：

1. 不黨：純以公民地位發表意見，此外無成見、無背景。凡其行為利於國者，擁護之；其害於國者，糾彈之。

2. 不賣：不以言論作交易，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，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。

3. 不私：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，對於報紙並無私用，願向全國開放，使為公眾喉舌。

4. 不盲：隨聲附和是謂盲從；一知半解是謂盲信；感情所動，不事詳求，是謂盲動；評詆激烈，昧於事實，是謂盲爭。吾人誠不明，而不願陷於盲。(註三〇)

這「四不」原則，含寓了報人高尚風骨與操持，表現了報業崇高目標

與道德信守。可貴的是，大公報從復刊至抗戰時期，確能實踐所主張，樹立了獨立報業的模式。

因之大公報具有卓著聲譽，對國事發揮其影響，尤其抗戰期間，大公報儼然成為全國的輿論中心。

一九四一年，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選出大公報為是年最佳的外國報紙，於五月十五日在該校舉行頒獎典禮。米蘇里大學教務長馬丁(Era-nx L. Martin)致函大公報說：「貴報今年被推得獎，端為一外國之自由的報紙，在其悠久的過程中，對於公眾具有優異的貢獻。吾人此項決定，兼得深知貴報偉大貢獻之美國記者的一致讚許。」(註三一)這是第一個中國報紙在國際上獲得重視與讚揚。

二學人創辦雜誌發揮影響：中國學者埋首書卷，對政治或抱消極態度，不予聞問。如胡適自美留學返國，即決定二十年不幹政治，二十年不談政治。

但民初至抗日戰爭之前，學人秉高度政治參與熱忱，藉創辦雜誌，以議論國是，宏揚了知識份子以「國事為己任」的傳統。

這批學人秉持一份信念：「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會改善的必要條件。」而「改良政治是我們唯一的義務。」因而他們創辦評論政治的刊物。「努力週刊」的發刊詞，最足以說明他們的懷抱。這是一首「努力歌」，其中第一、第三兩節是：

「這種情形是不會長久的。」

朋友，你錯了。

除非你和不許他長久，

他是會長久的。

×× ××

天下無不可為的事。

直到你和我——自命好人的——

也都說「不可為」，

那才是真不可為了。(註三二)

他們熱切於政治革新，並具有一種負責的觀念，以「奮鬥的好人」自

我期許。

在學人所辦的評論雜誌中，以獨立評論最出色：具有高尚的宗旨——要討論國家社會的問題。立言重理性——「不作刺激性文字，不供給低級趣味；」「不說時髦話，不唱時髦的調子」，強調立言「無所苟」。標揭獨立精神——不依傍任何黨派，不迷信任何成見，以負責言論發表思考的結果。（註三三）

獨立評論多論議時政，討論建國原則性問題，言論可以上達當局，發生其影響。在近代傳播史上，尚不多見。

這批學人不是專業的報人，不脫「書生論政」的型態，但就刊物的風格論，確為大眾傳播事業樹立了典範。

「新興廣播事業誕生：中國第一座「廣播電台」，於民國十一年設立，由美國人奧斯邦（P. Osborn）獲得留日華僑贊助，組織中國無線電公司（Radio Corporation of China），在上海大來洋房屋頂設置廣播機，揭開中國廣播事業的序幕。

此後，有二三電台繼起，但技術不精，人才未備，而接收機價值昂貴，一部售五百餘金，華人社會中不過一二部而已。（註三四）

至北伐完成統一，執政黨重視宣傳，除在各大都市發行黨報外，民國十七年由陳果夫倡議策劃，購置五百瓦特廣播機一部，在南京創立中央廣播電台；二十一年換裝七萬五千瓦新機，成為東亞最大的電台。

無線電新聞傳遞無遠弗屆，能克服時空限制及印製運送之繁，比報刊有更快捷與廣遠的效果。且不識字者亦能收聽，有其更大群的服務對象，所以廣播重要性愈益顯著。在抗戰之前及戰時，中央電台對新聞報導與國際宣傳，有其特殊貢獻。在大眾傳播史上，由印刷媒體發展至電子媒介，開始了媒介多元化的新時代。

四通訊社事業發軔：國人創辦通訊社的倡議，始於清末，宣統二年有全國報業俱進會組織，鑒於國際通訊社稿件，「常有顛倒是非變亂真偽之舉。」而中國的外國通訊社採訪新聞，又「各本其主旨，任意散佈，指鹿為馬，入主出奴。」（註三五）因而謀議自行創立一通訊社。只是並未實行。

當時有心人士發起而創立通訊社，較受矚目的為邵飄萍之新聞編譯社，胡霖之國聞通訊社，張竹平之申時通訊社，只是限於人力與財力，這些通訊社都未有穩固基礎，致影響發展。時黨營中央通訊社，於民國二十一年由蕭同茲出長，竭力經營，建立國內通訊網，使採訪觸角，由沿海都會伸入內陸腹地；自設無線電台收發新聞，突破時空的限制；建立國外新聞採訪網，擴大國外新聞報導；並與外國通訊社合作，收回路透社等外國通訊社在華直接發行中國新聞的特權。至是中國通訊社事業始具規模。

抗戰時期，中央社記者活躍各戰場，全國各地報刊的戰訊，幾全由中央社供給。此外，中央社大量擴充駐外單位，在國際大都市設特派員或特約通訊員，日益向國際性通訊社目標發展。

由於中央社成長發展，帶動了中國傳播事業的進步。時全國報紙除沿海都會者外，多設備簡陋，自中央社供應新聞，即使偏遠之區，只要具備一架收報機，就能獲得國內外重要新聞，內容版面頓形改觀，於全國人心齊一，增益時局的了解，發揮其影響。

抗日勝利之後，各種大眾傳播媒介在京滬平津等大都市擴張發展，呈現一片欣欣向榮現象。惟國家局勢動盪，在危疑震撼中，大眾傳播界很少能保持超然獨立地位，以國家利益為重，並對社會負責，致左傾風氣盛行。至民國卅八年大陸赤化，全國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報紙，被中共關閉或被沒收歸併，幾家歷史性報紙，都被改名，失卻原本性質與面目；雜誌、廣播事業無一能逃掌握，大眾傳播事業遭遇有史以來最大的浩劫。

伍、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發達

一、大眾傳播事業現況

近三十餘年來，大眾傳播事業在臺灣重起爐灶。起步雖艱辛，但自五十年代以後，由於經濟起飛，經濟繁榮及教育發達，在此有利背景下，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相繼蓬勃發展，展現新貌。

報紙：現時為止，全國報紙共計三十一家，包括日報二十四家，晚報五家，英文日晚報各一家。估計至民國七十三年止，發行總量為三百五

十萬份左右，平均四點八人擁有一份報紙；七十三年報紙廣告量為八十億元強，均屬有史以來創新的紀錄。

雜誌：現行雜誌，截至七十二年止，共計二千五百四十三種，也為大眾傳播史上雜誌種類最多的時期。近年專業化雜誌蓬勃發展，特別在工商、經濟、科學等方面，最見特色。

通訊社：現行新聞通訊社，共計四十四家，均以供應消息為主要業務。依性質不同，可分成十二種類別：綜合新聞、軍事新聞、文教及青年活衆新聞、經濟新聞、華僑新聞、天主教新聞、地方新聞、航海新聞、勞工新聞、建築工聯新聞、招標新聞與圖片新聞等。

這四十四家通訊社，規模大小不同，中央通訊社而外，發展步伐較為緩慢，多作專業性取向。

廣播：政府遷台之初，臺灣僅有電台五家，迄民國七十二年底，已增至三十二家，一七〇座電台，發射機總計三百三十七部，電功率總量為八二六二·二瓩。

民國五十七年始，中國廣播公司首創調頻電台，改進音響設備，發揮廣播媒介特性。此後多家電台跟進。民國七十三年，廣播廣告量超過十四億六千萬元，在傳播媒介中位列第三。

電視：為臺灣新出現的一種電子傳播媒介，兼具音響與影像，能同時提供視聽享受，因而成為大眾的寵兒。

臺灣電視事業始於民國五十一年，臺灣電視公司成立開播。五十八及六十年，先後有中國電視公司與中華電視台開創。

五十八年開始，電視事業進入彩色時代，節目由黑白改成彩色播出。同年，臺視中視第一次使用人造衛星轉播阿波羅十二號的發射與返回地球。之後，許多重要新聞與體育競技，都用衛星傳送。

二十餘年來，電視機急遽增加，臺視初播時，民間電視機僅四千架。至七十二年底，已躍增至四百五十萬架，平均每四人有一架。

電視公司業務蒸蒸日上，民國七十三年，三家電視台廣告收入高達六十二億一千萬元，成長百分之廿一點五七。三年之間成長率達百分之四十二強。（註三六）

二、大眾傳播事業的檢討

從大眾傳播史整體回顧，對近三十餘年來臺灣傳播事業經營，有下述兩點值得重視：

一是商業經營取向特別強化。每種大眾傳播媒介無不追求「企業化」，而且依俾日深。

這種經營方式，隨社會經濟繁榮，使事業本身獲得茁壯，並表現其特色：

(一)設備不斷更新充實——以報紙為例，絕大多數報社已採用高速彩色輪轉印刷機，都有彩色版面，使我國報紙進入「彩色時代」。今年二月，聯合報購置最新「海利斯一七〇〇型」高速輪轉印刷機，每小時印報十二萬份，可同時印報三大張，兩面彩色頁，價值美金六百萬元。此外，各主要報紙配合中央社電腦發稿及國外都市通訊，各添置中文傳真機一類設備，可隨時直接接收國內外圖稿。聯合報、中國時報更以全版傳輸方式，透過人造衛星，將排好版面，立即傳遞至美國、歐洲等地，供應當地華文世界日報、歐洲日報與美洲中國時報（後者於去年停刊）。

更重要的一項革新是中文排版電腦化，聯合報於七十一年九月十六日開始啟用，代替傳統的人工排字，達成工作精確快速要求，提高編排效率，並能降低生產成本。

而電視設備更新，三台均全力以赴。中視新建電視大廈，攝影棚工程包括機器設備，計投資一億四千萬元。整座大廈耗資達十億。

(二)新聞競爭激烈——各種大眾傳播媒介，無不重視新聞的快速報導，並獎勵記者挖掘獨家新聞。此外，各主要報紙、通訊社及電視台，都重視國外採訪，尤以報社投資最大，長期駐外特派員、特派記者與特約記者人數，迄七十三年五月止，總數達一百三十三人，分佈美國、日本、香港、韓國、西歐等國家及地區。

由於社會結構與型態的變遷，大眾生活領域的擴展，報紙內容亦有了改變，七十二年秋冬之際，幾家報紙作版面調整，將犯罪新聞由第三版移至第五版，第三版內容改為著重經濟、科技、醫藥、衛生、環境生態及消

費者福利等新聞，與大眾的生活需要相結合。

而國家處境維艱，自經退出聯合國、中美斷交等重大變故，大眾關心國際局勢與國家前途之情日切，面對這一情形，報紙多開闢專欄，請學者專家執筆，對政治經濟等受關切問題作分析。電視台亦新增新聞性專題節目，作較深入探討。

只是新聞競爭，亦帶來許多副作用，如新聞報導錯誤嚴重，最高記錄，曾有百分之七十的錯誤率統計。（註三七）近年來，內在條件改進未見顯著，大眾傳播媒介重視「獨家」，不計較採訪過程與內涵，亦忽視新聞記者的專業素養，而外在競爭日形惡劣。因而，新聞報導錯誤的改善，令人無法寄予樂觀。

更嚴重的是，大眾傳播媒介依舊以激情作風處理新聞，各色各式犯罪新聞依然是大標題大篇幅報導，取材角度與報導手法，仍不脫聳動與渲染。電視新聞將血淋淋悲慘畫面帶進收視的每一家庭，向報紙犯罪新聞跟進。這些都和高品質要求背道而馳。

二是報人傳統身份改變。個人報業時代，個人即是傳統媒介的主宰，以之作爲實踐個人主張抱負的工具。惟自大眾傳播媒介成爲一種企業，報紙需要厚集資本，文人辦報逐漸歸於淘汰。媒介商業化色彩日濃，「文人」在媒介中的地位日落，「工作自主權」因之削弱或喪失，這是近七十年來，傳播媒介在人事與權力結構上發生的最重大的變動。

西元七十年代，在北歐有報人起而爭取工作自主權，與報社發行人簽訂契約，新聞報導與評論一依報人良知與責任，不受雇主的意志支配。這一「運動」自北歐逐漸擴展至德、法、英諸國，之後橫越大西洋至美國，並獲得有力推動。

我國新聞編採及評論人員，自應求根據專業標準與良知行使職權，不受傳播單位內外的無理干預。只是我國報人並無相關團體組織，無法形成力量，除非有明確法律保障，將很難在短期內有所突破。

陸、中國大眾傳播事業的前瞻

一、新媒介的出現與競爭

近代傳播科技發展迅速，稱得上是日新月異，電腦、電信與傳播媒介結合，使大眾傳播事業呈現未可限量的遠景。

據預期到一九九〇年，愈來愈多的專門化資訊媒介將大行其道。可能的發展計有下列諸項：

多頻道双向式的電子聲光媒介——有線電視。在功能上，它超越無線電視，藉同軸電纜或光纖輸送，同一時間可以載運幾十甚至幾百幾千個訊號；並與電腦系統相連，能便利節目大量儲存、敏捷更新與隨時立即調取。

電讀（Videotex）被認爲將取代報紙，成爲未來大眾的資訊來源。有線電讀憑雙線溝通，與各類資料庫相連，提供資訊服務外，並可作交互性的來往，如「電子銀行」業務和「按鈕」選購日用百貨，都可在有線電讀機上進行。

電視錄影帶及碟影機將提供各種節目服務。（註三八）

這些新媒介的出現，直接的影響，將是促成品味文化的成長，民衆可依據自己的興趣與需要從事選擇，由被動轉爲主動，傳播媒介進一步與大眾生活緊密連結。

這一情勢的發展，使傳播媒介面對更激烈的競爭，在內容上自須謀求改進。以報紙爲例，預期未來讀者需要的內容可能是：

更有幫助性：有很多關於地點、方法和詮釋性的指引。

更具分析性：較少報導性新聞而較多說明。

更個人化：有較多的專欄。

更地區性：著重於介紹當地人物和他們的生活。

更有組織：有較佳的地區劃分及版面分配，有助於迎合讀者的需求。

更具可讀性：圖表照片清晰及流暢的文字。

更富積極性：新聞內容與社論精益求精，以求完整的報導及爲提出的

問題尋求答案。（註三九）

其實，這只是從好的一面預期。大眾傳播事業是社會體制的一環，社會整體未曾進步，大眾精神生活品質在物質競逐的社會風尚下，不求提昇，則大眾傳播媒介內容的改進，必然得經歷漫長而艱澀的過程。

二、永不可變的特質

惟展望未來，無論傳播科技如何進步發展，大眾傳播媒介有其永不可變的特質：

第一，崇高的經營目的：當年梁啟超辦報，標榜宗旨要定而高，要以國民最多數之公益為目的。否則牟利、獻媚權貴也可說是一項宗旨，其間高低固有一大區別。

胡適辦刊物，重視高尚的目的，認為辦報要做到兩個地步，第一是要值得一駁——要有主張；第二是要禁得起一駁——有學理與見解做根據，以公開態度發為公開的主張。

而張季鸞辦大公報，值國勢杌隉之際，秉言論報國志懷，毅然要「為鉛刀之試，期挽狂瀾之倒。」

知識份子之辦報刊，都了然於大眾傳播事業本質上具有教育性與服務性，職責神聖。而大眾傳播事業崇高的評價，即得自於它的高尚目的。傳播媒介可以為福，同樣可以為禍，其關鍵即繫於此。

所以，一家報社，一份雜誌，或電視廣播、或新興媒介，均應是社會的公器，而不宜視為是私人的產業。經營的宗旨，應是國家社會的公利公益，除此之外，別無意圖。報人及大眾傳播事業的不朽，即以此作鑑定。

第二，重視教育功能。西方人辦報具歷史觀念，報人以歷史家自許。

如紐約時報於六〇年代，曾因印刷工人罷工而停刊三個多月，惟記者編輯在停刊期間，未嘗一日停止工作，仍一如往常的採訪新聞與編輯。排好版面，逐日保存。等工人復工後，將保存版面分次全部印刷出版。他們之所以如此做，最主要理由是：要給後代保留今日的史實，不使歷史中斷。

中國知識份子辦報則重教育，他們鑑於一國的進步，有待於民智的提高，一如寒暑表，溫度的升降，取決於外在空氣的冷熱，不容假借。所以，他們從直接參與政治改革的意願中，轉而致力藉報刊教育民衆。

因而，他們創辦報刊，著重在輸入新知識，啓導新觀念，擴展民衆的眼界與胸襟。

前期報人的作為，值得後人的尊敬與重視。特別是當茲商業發達時代

，一般人在物質生活中迷失。如史懷哲指出，現代人享有最舒適的生活，但個人不願思考，不求進步，只尋求最不需要依賴精神力量的低俗娛樂。（註四〇）大眾傳播媒介的教育作用，於此更見重要。

孔子於民衆經濟生活不寬裕時，主張「富之」，富了之後，認須「教之」。而這一使命，今天必須由大眾傳播媒介擔起。

第三，促進民主政治。在民主國家，大眾傳播事業與議會制度，一如民主政治的兩翼。前者在政治上之表現：（一）報導政府處理公衆事務，使人民知曉，由之養成開明輿論與理性行為；（二）藉公開消除隱密，淨化政府，迫使官員產生對人民的責任感；（三）媒介評論，刺激政治事務的改革。

大眾傳播媒介藉助於新科技，在公開報導事實及公共評論上，將更有廣被與迅速的功效，於強化民主制度，自可作更大貢獻。

中國近代報業的產生是以革新政治為職志，並譯介提倡西方民主自由新說。因而，中國近代報人都具有西方自由主義理念，言論自由蔚成大眾傳播事業的主導精神。

而重言責亦是中國知識份子的一項可貴傳統。宋代范仲淹寫「靈烏賦」，有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的壯語。盡言責甚至看成是自「天」授予的一種責任。（註四一）

惟古代知識份子的言責觀念，只是對人君的消極諫諍，必待了解傳播事業的功能，超脫於政治的臣屬關係，以大眾代言人身份，體察公意，關注民瘼，發為客觀獨立的言論，始克發生積極的政治監督作用，產生輿論的力量，導致和平的改革。

當前大眾傳播事業秉持一項共同信念，即民主憲政是國家唯一的前途，民主是反共最有力的武器。傳播事業以人民喉舌、政府諍友自勉，增強民主憲政力量，正所以扭轉歷史的形勢，開拓國家的機運。

第四，「人」為本位。社會大眾幾無不透過新聞記者的耳目看外在世界。今後，在傳播科技神速進步下，大眾將對記者的仰賴愈深。

惟解決問題無法依恃科技，而需要靠人。因而，大眾傳播事業仍以「人」為主宰，需求的是健全的個人。

在中國文化價值系統中，人最受尊重，賦有最高尊嚴。孟子說：「人

皆可以爲堯舜。」即充份宏揚斯義。所以，新聞記者必須自尊自重，秉道德操持，以高度智慧，犀利眼光，發掘、預測各方面產生的問題，並予以分析解釋，由之使大眾認知自己所處的環境，並能善自決斷。

無論新聞科技發展帶給大眾傳播事業多少衝擊，新聞記者在科技中最值得尋求的，是科學求真的精神，能從這一層面反省體察，才能保證記者的值得信賴，與大眾傳播事業的崇高價值。

註 釋

- 註二八：呂光、潘賢模中國新聞法概論，頁九。
 註二九：胡適「報紙文字應該完全用白話」，胡適選集雜文。
 註三〇：張季鸞「大公報一萬號紀念辭」，季鸞文存上冊頁二八。
 註三一：袁昶超中國報業小史，頁八六。

岳飛行實與岳珂事蹟

李 安 著
 定價四五元

分甲乙兩編，甲編係就岳飛孫岳珂所著「武穆行實編年」原文，分年分事，依據史書，加以註釋，以認識最真實之岳武穆年譜傳說。乙編係根據岳珂事蹟及名著六種，介紹其史實，末附「宋史岳飛傳」及年表，俾資參考。

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

註三二：胡適「努力歌」，努力週刊第一期。

註三三：胡適「獨立評論的一週年」，獨立評論第五一號。

註三四：朱其清「無線電之新事業」，東方雜誌廿二卷六號。

註三五：同註十二。

註三六：所引述各種大眾傳播媒介發行及廣告數字，參考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出版年鑑，中國出版公司編印。

註三七：徐佳士「我國報紙新聞『主觀性錯誤』研究」，新聞學研究十三集，頁二一。

註三八：徐佳士「資訊社會的媒介問題」，從倫理到科技，頁二〇三。

註三九：歐陽醇譯大眾傳播一九九〇，頁二九—三〇。

註四〇：史懷哲著、鄭泰安譯文明的哲學，頁三三。

註四一：胡適「寧鳴而死，不默而生」，胡適選集雜文。

人人文庫特七四〇

三韻詩三百首

陳香 選輯
 定價四五元

三韻詩亦稱六句詩，介於絕詩（四句）、律詩（八句）之間，聲調緩促適中，別成一體。本書計選入二三七首，其中五言者三百首，七言者三七首。上自漢魏，下迄明清，均爲歷代名詩人得意之作。